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十二大」後的中共對外政策：持續與改變

doi:10.30390/ISC.198211_22(2).0001

問題與研究, 22(2), 1982

Wenti Yu Yanjiu, 22(2), 1982

作者/Author：尹慶耀

頁數/Page：1-1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2/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1_22(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十二大」後的中共對外政策：持續與改變

尹慶耀

一般說來，共黨領導人都具有教條主義與實用主義的雙重性格，共黨政策都具有意識形態和政治現實的兩種成分。中共並不例外，其每個階段的對外政策，有因意識形態而持續的部分，也有由政治現實而改變的部分；既可說是內政的延長，也可說是國際環境的反應。分析過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總綱有關對外政策部分，和胡耀邦報告中的第五節「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使我們深信上述的觀點，應該是正確的。

「十二大」路線主要是十一屆六中全會路線的繼續。在那次全會後，胡耀邦在一次重要講話時強調：「我們善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推向前進」^①。這句話就說明了中共政策是持續中有改變，其改變又有一定的限度。

回溯六十年代中共和蘇聯激烈論戰的當時，中共曾公開表示：「在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以後，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要處理三個方面的關係，這就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係，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②。

今後中共仍然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處理這三個方面的關係。關係會因內外條件的差異作微妙的調整。現今中共對外依舊奉行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但對三個世界的關係也會有些微的改變。不過，「十二大」黨章總綱

註①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註②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胡耀邦在大會的報告中說：「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相信共產主義最後定會在全世界實現」^③。一切改變都將以不妨害這個最終目標為前提，一切努力也都會朝向這一總目標前進。

胡耀邦又說：「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爲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爲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④。此時此地，特別徵引此數句毛語錄，顯示中共將製造和平假象，以便獲取國際支援，從事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但那並不意味着將革命、鬭爭根本放棄。

單就「十二大」黨章中對外政策那段短短的文字看，中共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以及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組織（團體——筆者）和人士（個人——筆者）的團結」，團結的範圍是夠廣泛的。中共要「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關係」。胡耀邦在大會報告中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我們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係」。把五原則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在解釋上已較前擴大了範圍（前此僅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間——筆者）。中共還要「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我黨（中共——筆者）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這顯示中共要放寬限制尺度，改善它同其他共黨與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

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中共對外將全面推展國家對國家的外交（State to State Diplomacy）、人民對人民的外交（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以及同志對同志的外交（Comrade to Comrade Diplomacy），那將是一個廣泛的統戰（United front）攻勢。很顯然，對外統戰活動的重心仍然是第三世界，那是不變的。至於在大國之間，中共將尋求某種程度的平衡，利用「玩牌」手法博取實際利益。爲了對內建設和對外統戰的需要，中共會製造和平假象。例如從黨章總綱中有關國際事務的文字裏，沒有發現過去慣用的「革命」、「鬭爭」、「戰爭」等字樣，卻代之以「和平」、「正義」、「人類進步」等等。胡耀邦報告提到「世界大戰」、「鬭爭」等等，語氣也不像先前那樣激烈。當然，如前所述，他依舊相信並且要促成共產主義最後在全世界實現。

在「十二大」召開之前，中共施用壓力與美國發表「八一七聯合公報」，那和九月九日中共發射的科學實驗衛星一樣，可以

註③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胡耀邦代表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向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註④ 同註③。所引毛語原註：「毛澤東：『爲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一三三頁」。

爲鄧派壯聲勢，對內部反對與美國接近者發生一些鎮懾作用。可是，顯然中共並不以此爲滿足。

胡耀邦在大會的報告中說：「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爲基礎的，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它有長遠的、全局的戰略依據，決不遷就一時的事變，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動。正因爲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制定的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世界上贏得了信譽，贏得了朋友，保持了自己在國際交往中的尊嚴形象」。他這段話是在強調「獨立自主」，是對美蘇而發，但明顯地偏於指向美國而言。而「尊嚴形象」的保持，是中共外交再轉向第三世界所必需。

中共與美國接近，始自「教條主義」的毛澤東，而不是「實用主義」的鄧小平，這證明把共黨領導人簡單地分作「教條主義」或「實用主義」是並不恰當的。中共過去一直把美國看作「世界憲兵」、「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對捷克用了兵，不久又提出所謂「有限主權論」，表示蘇聯有干涉其他共黨國家的權力，於是毛澤東開始轉變他的策略。恰巧那一年是美國大選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在競選過程中鼓吹當選後立即圖謀與中共接近，於是就有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時的「上海公報」。捷克事變十年後的一九七八年，蘇聯在亞非的擴張頗有進展，與印度（一九七一、八、九）、伊拉克（一九七二、四、九）、安哥拉（一九七六、十、八）、莫三鼻給（一九七七、三、三十一）都已簽有「友好合作條約」。同（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間，蘇聯夥同古巴介入衣索匹亞和索馬利亞的軍事衝突，短期內運送了十億美元軍火，派遣萬餘名蘇古軍事人員到非洲之角。四月廿七日阿富汗政變，由馬克思主義者塔拉基（Noor Mohammad Taraki）繼遇害的陶德（Mohammad Daud）出任總統，與蘇聯進入蜜月期。五月間蘇聯再度挑起薩伊事件，六月間進一步插手紅海地區。

在東南亞，中南半島赤化後，中共與越南的關係轉惡。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中共照會越南，停止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調回當時尚在越南工作的中共工程技術人員^⑤。一九七八年三、四月越南迫害在越華僑，六月十五日中共派「明華」號和「長力」號輪船赴越南接僑，七月間空手而還。另一方面，越南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九日正式加入「經互會」（COMECON），成爲這個由蘇聯控制的赤色共同市場的第十個會員國。

就在中共派輪接僑時期，中共的「僑務辦公室」副主任林修德說：「越南排華向修正主義的泥淖裏越陷越深；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看來也是親蘇軍人搞的；北韓態度仍欠明朗化。亞洲只有尼泊爾仍然保持不變，能夠談得上與我們共進退同生死患難的，恐怕找不出一兩個。阿爾巴尼亞已熄掉光照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在非洲爲它大力建設坦尚鐵路的坦、尚兩國最近與我們也有了疙瘩，新的關係沒打穩基礎，舊的關係卻走的走、翻臉的翻臉，即使不翻臉也臉黑黑」。

註⑤ 中共入新華社北平（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電。

中共的孤立感，當然並非自此始，它所感受的主要威脅係來自蘇聯。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上，就有了「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字樣，把「蘇」置於「美」之上。一九七八年二月中共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序言中，也有「聯合一切受到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侵略、顛覆、干涉、控制、欺負的國家，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詞句，把「社帝」置於「資帝」之前。五屆「人大」後，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高級頭目，不斷分頭外訪，企圖組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對蘇聯進行反包圍。

就在此一情況下，中共於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將其對外活動重心轉向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中的美國，八月十二日與日本簽訂「和約」，十二月十六日與美國發表建交公報。不過，這也招來同年十一月三日蘇越廿五年「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十一月廿日蘇聯衣索匹亞的「友好合作條約」、和十二月五日的蘇聯阿富汗「和平友好睦鄰條約」的簽訂，以及十二月廿五日越南以十五萬大軍支援「高棉救國民族統一戰線」對高棉發動旱季大攻勢。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邊陷落，韓桑林(Heng Samrin)取代中共支持的波布(Pol Pot)政權，是北平的一大失敗。同月間鄧小平訪美，一方面鼓吹美、日、西歐和中共組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一方面聲言要對中共指為「東方古巴」和「小霸」的越南加以「教訓」。二月十七日中共軍大舉攻越，這無異是對蘇聯提出警告。在這一段時期，中共對蘇聯擺出強硬姿態，對美、日等則相當友善。

III

美國與中共建交，固然是由於卡特(Jimmy E. Carter)政府的主觀意願^⑥，但蘇聯過度擴張的刺激，也是催生劑之一。只是雙方接近各有限度，是不應忽視的。

對於中共「教訓」越南之戰，不光遙遠的西歐不太關心，日本還加以反對，美蘇都不曾介入，就是說華盛頓和莫斯科並未因此而加劇衝突。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黃華宣布中共軍從越南全面撤退。四月三日中共五屆「人大常委會」決定俟中共與蘇聯的三十年「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於一九八〇年四月滿期後不再延長。黃華立即將此決定通知蘇聯駐平大使伊·謝·謝爾巴科夫(I. S. Shcherbakov)，但同時建議與蘇聯舉行部長級會議，談判改善雙方關係。中共憬悟到對蘇聯的惡化和對美國的友善，都已接近臨界點，需要一次策略轉換。

有些跡象值得在此一述。就在同美國建交的一九七九年，中共內部為蘇聯摘掉了「修正主義」的帽子。同年六月，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劉平，隨同中共對外貿易代表團赴蘇參加貿易談判，八月間返平。九月，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前

註⑥ 參閱卡特回憶錄中「美國與中共建交」一章，臺北：「聯合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第三版譯文。

駐蘇大使)王幼平，以首席代表資格率團赴莫斯科參加雙方「關係正常化」談判(實為副部長級談判)，第一輪談判結束後於十二月返平。劉、王二人先後返回大陸後所作的報告，對蘇聯的政治、經濟都作了肯定的評價。「關係正常化」談判雖因蘇聯進軍阿富汗，由中共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廿日單方面聲明無限期延期，但雙方並未終止向緩和方面鋪路。

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在對外關係部分說明：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和經濟文化往來」。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演說，對中共發出改善關係的呼籲，也提到經濟、科學、文化的交流。胡耀邦在「十二大」的報告中也提到同世界各國開展經濟文化合作。這是有意的呼應，還是無心的巧合，且不去管它。但近年來，中共同蘇聯在這些方面的往來已較前此頻繁，則確屬事實。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中共體操選手曾赴莫斯科參加世界錦標賽。一九八二年六月蘇聯田徑選手赴平參加「中蘇運動會」，那是一九六五年以來的首次。在經濟方面，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共和蘇聯簽訂了邊境鐵路連絡運輸委員會的議定書以及一九八二年度貿易支付協定，將雙方貿易額較上年度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五，東北地方雙方邊界貿易重開。在文化方面，雙方交換了留學生，並於一九八二年九月簽訂了圖書出版物互相交換協定。在人員交流方面，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三名經濟學家劉國光(「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柳隨年(「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鄭力(不詳)赴蘇，以中共駐蘇「大使」楊守正私人貴賓身分由楊陪同拜訪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考察了蘇聯的經濟計劃管理制度。蘇聯的中共問題專家、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外交學院院長、「蘇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主席病故)齊赫文斯基(S. Tikhvinskiy)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抵平逗留兩週，會晤過中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禮貌性」的拜訪過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同年五月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長、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談判」蘇方代表團副團長卡比察(Mikhail Kapitsa)抵平(自一九八〇年起，他每年前往大陸一次——筆者)，以蘇聯駐平大使私人貴賓身分與中共官方人士接觸。八月間于洪亮曾赴莫斯科訪問了蘇聯外交部，而後轉往華沙訪問波蘭外交部。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路線進行得並不順利，反而將西方的自由思想引進中國大陸，產生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招致內部若干人的就心與反對，因而在一次專家舉行的研討會中，多數贊成中共採取蘇聯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前引三位訪問過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的中共專家，返回大陸後在報告中再度對蘇聯的政治、經濟情況作出肯定的評價。如果中共重新走向蘇聯的經濟模式，對於雙方關係當有決定性的影響。

四

「十二大」後的中共對外政策：持續與改變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曾擔任過一九六九年開始北平的「中蘇邊界談判」蘇方代表團長及一九七九年在莫斯科開始的「關係正常化談判」蘇方代表團長的伊里切夫(Leonid F. Ilichev)於十月四日率團抵平，他不是蘇聯駐平大使的私人貴賓，而是以正式外交官的身分出現。以時聞言，他之出現在北平，是中共藉故和美國鬧彆扭、中共「十二大」剛剛閉幕後不久，和布里茲涅夫一再呼籲同中共改善關係之後，因而頗引起世人的矚目。

五日起，伊里切夫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舉行會談，以試探停頓了兩年九個月的關係正常化談判恢復的可能性。十七日胡耀邦宣布中共和蘇聯已同意恢復正式談判。據悉伊里切夫和錢其琛會晤了六次，還討論到邊界緊張、阿富汗、高棉以及其他使雙方關係緊張的問題。

胡耀邦說：「中共誠摯希望去除中共和蘇聯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障礙」^②。中共和蘇聯之間還有那些障礙呢？

中共已不再抨擊蘇「修」，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只呵責它的擴張政策、霸權主義。布里茲涅夫於三月廿四日在塔什干講話，指稱在世界舞臺上，北平常與帝國主義政策相結合，與社會主義利益對立。之後又說：「但我們從未否定中共社會主義社會體制的存在，現今亦復如是」。雙方既互相承認對方為社會主義，彼此就再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

中蘇共之間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已沒有黨與黨的關係，意識形態的對立消除，對黨的關係之改善就減少了障礙。中共「十二大」黨章總綱中聲言，要「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依獨立自主原則，發展中共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如果蘇共願意尊重中共的平等地位，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中共頭上，雙方黨的關係可否「發展」，豈不耐人尋味？

我們一向認為中共和蘇聯不是言歸舊好，也就不會恢復五十年代的親密關係，但緩和緊張則是可能的，因為那樣對它們雙方都有好處。今年五月廿日，蘇共「真理報」上有段話說：「根據我們的深刻信念，蘇中關係改善的實際可能性是存在的，放過或錯過這種可能性，就意味着與兩國人民的利益與廣泛的國際利益背道而馳」。偏巧胡耀邦在「十二大」的報告中也說：「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實際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雙方都認為「可能」，那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北平和莫斯科都在向緩和緊張的途程上前進，但步調將是非常緩慢的。當伊里切夫還逗留北平時，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於十月十一日對在北訪問的西德總統卡爾·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說：「中」蘇已經就局部緩和和國與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進行了新的一輪磋商。「中國」相信，目前的緊張關係，可以得到緩和。但「中國」不相信蘇聯會改變它的霸權主義政策^③。十三日鄧小平又對西德總統表示，在與伊里切夫的接觸中，中共強調：(一)蘇聯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二)蘇聯軍隊撤出阿

註② 八合衆國際社北平(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第一版。

富汗；(三)蘇聯從中蘇邊境撤軍。對此，雙方意見不一致。「但是，中蘇會談是正常的、必要的」^⑨。從這些言詞中，可以體會得到，中共和蘇聯的正式談判即使恢復，仍將是馬拉松式，不會很快有結果。但雙方關係不會再惡化，而是在為緩和、改善鋪路。

鄧小平所提的三項問題，是過去中共所一向堅持的，甚至曾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作為恢復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前提條件。如今雖不再堅持這一前提，但此一問題，不，實際是這三項問題都不很容易解決。當然，天下沒有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中共和蘇聯關係若獲改善，則中共與越南的衝突就會比較容易解決。阿富汗問題將是中共對蘇談判的一支籌碼，蘇聯的條件不能令中共滿意，中共就會在這個問題上嘵嘵不休；蘇聯的條件中共可以接受，阿富汗問題何妨擱置不提？至於中蘇邊境駐軍問題，所謂蘇聯的百萬大軍，應是遠東區蘇聯陸、海、空軍及飛彈部隊等的合計數字，那些並不都在中蘇邊界，而邊界蘇軍只有十二師。據「法新社」透露，前日本社會黨委員長勝間田清一引述最近在莫斯科會晤的蘇聯共黨中央國際部副部長柯瓦連科(I. I. Kovalenko)說，如果中共將其兩百萬邊界駐軍予以削減，蘇聯將答應中共的要求，裁減在中蘇邊界的蘇聯軍隊^⑩。這或許只是蘇聯對中共的口頭反擊，而並非本意。不過，蘇聯裁減中蘇邊界駐軍，勿須顧慮中共的威脅，反可減少後勤支援的費用，而巴姆(BAM)鐵路完成後，一旦有事，蘇聯仍可將軍隊迅速運回邊界地帶，以蘇聯乃至中共目前經濟情況言，互減邊界駐軍，可以減輕軍費負擔。當然這不是容易實現的，但也不能說絕無可能。

據較早時期日本「共同通信社」的報導，日本獲得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底執筆、一九八〇年一月在幹部中間通傳的一項機密文件，標題為「當前國際情勢中的若干問題及其展望」，內容與中共公開表示的姿態頗有出入。例如，關於越南問題，文件認為蘇聯若過於拉攏越南，將是替在經濟等方面陷入困難的越南分擔責任，「蘇聯不會願意肩負那些沉重的包袱」。對於一九七九年初開始的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談判，中共已料到會是馬拉松式，雙方能夠接受的至多不過：(一)改善國家關係(言外之意是黨的關係難以改善——筆者)；(二)加強貿易等等的往來；(三)互不使用武力；(四)和平共處。文件又指稱，蘇聯的主要勢力不是指向中共，而是指向美國，且舉出蘇聯不介入中共和越南的戰爭為例，證明蘇聯不願因與中共的衝突而分散其戰力。文件又判斷布里茲涅夫體制，將在八十年代崩潰，預測屆時或將是以基里連柯(Andrey P. Kirilenko)為中心的集體領導局面出現^⑪。這是一個為時較早的文件，由於歲月推移，情況會有些變化，但對於我們瞭解這兩個共黨政權間關係演變的趨勢，仍然是有所幫助的。例如，中共注意到布里茲涅夫體制的崩潰，它是否準備屆時(八十年代內)與蘇聯改善關係，就頗耐人尋味。又，中共認為改善國家關係是雙方可以接受的。「十二大」黨章強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過去「十大」黨章上的「打

註⑨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第七面。

註⑩ 法新社：東京(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十四日)第一版。

註⑪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一月廿九日)第七面。

倒……現代修正主義」、「十大」和「十一大」黨章上的「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以及一九七八年「憲法」序言中的「社會帝國主義」字樣，都不曾出現在「十二大」黨章的對外政策部分。如前所述胡耀邦的「十二大」報告第五節「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一部分，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的關係。那麼，蘇聯也應該是根據這「五原則」發展關係」的對象。

「十二大」黨章中，仍然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不過，一九八〇年一月鄧小平在北平「人民大會堂」對萬人幹部講話時提出的八十年代中共三大任務是：(一)反霸；(二)統一；(三)四化。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所提的八十年代三大任務與前者相同，只是順序改為「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把反霸移到最後。這當然不是無心而是有意的改變。

從一九七九年的機密文件看，中共似乎還不準備與蘇共改善黨的關係。鄧小平對西德總統卡斯滕斯談話時，也說明目前的中蘇會談，只涉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涉及黨與黨之間的關係^⑫。可是，如果將來蘇共依照中共「十二大」黨章上發展黨與黨關係原則（全文見前引），允與中共「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不像胡耀邦「十二大」報告中所說「自封的老子黨企圖」控制中共，那麼，黨與黨關係的改善也就可能了。這當然也不是目前的事。又，中共「十大」和「十一大」黨章都有「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一語，其所指是過去中共在國際共黨中所摘的帶有「馬列」字樣的分裂組織，一九七三年時中共說全世界已有六十八個那樣的黨和組織^⑬。自從中共與美國接近後，該等共黨與組織大都背離了中共。而中共現今幾乎對所有共黨，「不論是大黨還是小黨，歷史長的黨還是歷史短的黨，執政的黨還是沒有執政的黨，都不能有尊卑之分」，「一律平等的」（以上均胡耀邦報告中語）加以拉攏。因此，「十二大」黨章只要求「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發展與各黨的關係，沒有了「真正的」字樣，甚至把「列寧主義」也省略掉，這是為了便於拉攏標榜脫離莫斯科路線的若干歐洲共黨。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的代表者，對蘇聯激烈抨擊的西班牙共黨總書記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義共總書記貝林格（E. Berlinguer），都曾應邀訪問過北平。就是又逐漸接近蘇聯、支持蘇聯進侵阿富汗的法共總書記馬歇（G. Marchais），也在中共「十一大」後的十月十四日抵平，那是彼此「斷交」十七年後法共首次派團訪問中共。中共當前致力改善關係的是這些共黨而不是蘇共，但中蘇共意識形態與最終目標相同，是不容否認的。胡耀邦在歡迎馬歇時說：「我們認為，兩黨之間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現象。……但是，有意見分歧並不妨礙兩黨同志式的交換意見，互相合

註⑫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第一版。

註⑬ 「世界人民革命的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一九七三年，中共昆明軍區連隊形勢教育提綱第一課，〈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三六六頁。

作」^④。中共與蘇共難道就不可以如此嗎？雖然時間會延緩一些。

綜上所述，可知目前中共與蘇聯的談判僅限於國家關係正常化問題。伊里切夫在北平時開始的第一階段會談，最初是表達各自的立場，廿一日開始討論有可能獲得進展的雙邊關係。

回憶一九六九年開始的邊界談判，蘇聯首席代表原為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Vasily V. Kuznetsov，現任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他是談判、折衝的能手，由於和中共的談判曠日持久，蘇聯就把他調回，改派伊里切夫繼任。伊里切夫曾任蘇共中央思想理論委員會主席，是黑魯曉夫時代的紅人，布里茲涅夫政權登臺，他被調為外交部許多副部長之一，事實上是坐冷板凳，由他接替庫茲涅佐夫，就意味着談判是馬拉松式。一九七九年關係正常化談判和目前在北平的會談，又由他領班，顯示蘇聯也不會預期會很快談出結果。從鄧小平等人的談話中可以體會得到，談判未必能解決問題，但可以緩和緊張。這正是中共所期望的，其實蘇聯何嘗不是如此？

話說回頭，伊里切夫可能是馬拉松談判的象徵。我們不敢說雙方談判到達有實質成果的決定性階段，蘇聯一定會把伊里切夫撤換，但萬一有走馬換將的事實出現，那就要自由世界密切注意了。

如前所述，我們已注意到中共和蘇聯實質交往較前頻繁，布里茲涅夫於三月間在塔什干對中共發出的呼籲中，有承認中共是社會主義制度，對臺灣有完全的主權、不提先決條件與中共恢復談判等內容。九月間他在巴庫講話，聲稱蘇聯同中共的關係，在健全思想的基礎上，在互相尊重和互信的基礎上正常化以及逐漸「健康化」將是很重要的事情。十月初在莫斯科同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長征（Truong Chinh）會談時，布里茲涅夫又表示在對中共的關係問題上，蘇越觀點一致，主張同中共保持正常睦鄰關係，主張同中國人民友好。綜上所述，無論在談話內容或語氣上，確已與前有所不同。而中共的回答，並非一口拒絕，只表示不重視蘇聯的言詞而重視它的具體行動，那是一種關門而不上鎖的態度。我們認為中共和蘇聯確實在向緩和、睦鄰、正常化方向前進，但不會戲劇性的突變成「團結」、「合作」的關係。因為雙方實力懸殊，中共不容易爭得它比較滿意的妥協條件。它企圖藉統戰手法在西方援助下，充實自己的軍經實力，增加它同蘇聯談判的資本，提高它同蘇聯談判的地位，才可能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等條件下與蘇聯妥協。

西方對中共與蘇聯終將走上一條道路一事過於鈍感，對雙方的現實接觸又過分敏感，那正提供中共一個玩牌的好機會。

五

註④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第一版。

提到玩牌，趙紫陽講過中共不玩牌，黃華也說過不對美國玩蘇聯牌，也不對蘇聯玩美國牌。這些話不能依票面價格接受。從「十二大」的文件看來，當前中共正想在大國間謀求一種平衡局面，來施展它的玩牌手法。

胡耀邦「十二大」報告中，具體提到日本、美國和蘇聯，以不同的語氣與態度分別對待。

對日本，他首先說彼此是近鄰，「中日兩國人民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誼」。他確曾指摘日本美化侵略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的史實，妄圖恢復軍國主義；但也聲稱「中日兩國發展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的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有利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末了他更強調「我們要同日本人民和日本朝野有識之士一起，排除一切妨害兩國關係的因素，使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日本和中共的貿易有下降趨勢，但它仍是中共最大的貿易對手。在自由世界中，日本給予中共的援助最多。可是，近一兩年來，日本對與中共貿易、合作以及對大陸一般經濟情況頗感失望，行動變得比較謹慎。於是中共就藉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上的史實，以強硬姿態換取援助。因此它一方面抨擊日本，一方面歡迎日本通產大臣安倍晉太郎及首相鈴木善幸先後往訪，九月廿七日雙方舉行一九八二年度貸款的換文簽字儀式，趙紫陽和鈴木善幸均行參加。中共獲得日元貸款六五〇億圓（約合美金二億五、〇〇〇萬元），它對日本的抗議也就平息了。理由是一則它已敲到一筆錢，二則在日本侵略中國問題上繼續鬧下去，會把中共當年不曾抗戰只趁機擴充實力、準備叛亂的事實揭穿。

胡耀邦提到對美關係時，口氣就頗有不同。他雖然說「建交」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但強調「兩國關係中一直存在着陰影」。然後在軍售與臺灣關係法上作文章，指美國「把臺灣作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對待」，「是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爲」。他希望「八一七聯合公報」上的規定將得到「切實履行」。最後聲稱「中美兩國關係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才能繼續取得健康的發展」。最惹起我們注意的是，胡耀邦絕口不提美國所殷切寄望的「平行的戰略利益」！

其實，除了反對蘇聯一點外，中共與美國根本就沒有「共同利益」。中共一直支持北韓的「統一」計劃，要求美軍撤出南韓。北韓內部因反對金正一發生鬪爭，今年初傳有若干軍官投奔中共，中共卻將此視爲拉攏北韓的好機會。鄧小平和胡耀邦於今年四月秘密訪問平壤，並曾提供四十架米格二一戰機給予北韓^⑤。九月十六日金日成抵平訪問，受到中共盛大歡迎，北平與平壤的距離遽形接近。中共永遠不會將北韓推向蘇聯一邊，也就永遠不能在朝鮮半島與美國採同一立場。在對波蘭、福島以及中東問題上，中共也與美國政策背道而馳。

註⑤：〔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第一版。〕臺北：《中華日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第五版。

認真說來，自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以來，雙方關係就開始緩慢冷卻，進入八〇年代更逐漸降低。因為中共需要對蘇緩和並將對外活動重心再度轉回第三世界，它就不能與美國過於熱絡。

自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以來，在秘書長選舉中，起初中共是隨同第三世界投票。一九七六年轉而隨從多數選舉華德翰（Kurt Waldheim）任秘書長。一九八一年的秘書長選舉，中共與美國對立，支持坦尚尼亞的外長沙里姆（Salim A. Salim）出任斯職，對華德翰連任則使用否決權反對。結果該兩名候選人退出競選，由秘魯籍的裴瑞斯（Javier Perez de Cuellar）當選新秘書長。據當時一位資深的非洲外交人員表示，中共（對華德翰）投否決票對第三世界極關重要，這證明中共履行其一直宣佈的對第三世界的承諾，並顯示其敢與美國對抗^⑥。

中共與美國關係冷化，是爲了它和蘇聯及第三世界打交道的需要。軍售只是一個好藉口，可藉此破壞中美關係。表演一下強硬姿態，挫一挫美國的銳氣。如果美國不理會，它不會認真降低雙方的外交關係。再則，即使沒有軍售問題，中共也會另找題目作文章，那本來就是一種統戰鬭爭的伎倆。美國不能，與中共發表「八一七聯合公報」，成爲鄧、胡召開「十二大」的伴奏曲，「公報」中那些模稜含混可作多種解釋的詞句，又可作爲未來中共再度「扯皮」的依據。中共逼使美國謹慎地採取低姿態這件事本身，就使中共在氣勢上獲得了勝利。

胡耀邦「十二大」報告，也談到對蘇關係。他一開頭就說：「中蘇兩國關係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友好的」。他把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歸咎於蘇聯的霸權主義（中間照例指摘蘇聯侵略、擴張、挑釁、威脅），又說中共注意到蘇聯領導人「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從第三者的立場看來，繫鈴人有意解鈴，在邏輯推理上應該是有結果的。不過，胡耀邦再度重複中共的老調：「重要的不是言辭而是行動」。然後就明白而肯定地說：如果蘇聯解除對中共安全的威脅，雙方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原文見前引）。最後聲言：「中國人民同蘇聯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誼，無論中蘇之間的國家關係還處於什麼狀況，我們都將努力維護和發展這種友誼」。

從胡耀邦的語氣以及中共的最近行動看來，中共是在以高姿態玩牌，也就是以恫嚇、抨擊等手段，達成統戰目的。不過，對美國似乎比對日、蘇更嚴厲些。

其實，蘇聯在西方分化美國和西歐的關係，在東方利用美、日、中共的矛盾，也採玩牌手法。當中共指摘日本竄改教科書、復活軍國主義時，蘇聯宣傳機構就大事渲染日本過去的侵華史實。當中共和美發生齟齬時，蘇聯宣傳就從事挑撥並擺出拉攏中共的姿態。今年十月中旬，蘇聯電臺還就美國「新聞週刊」摘要披露前總統尼克森的談話一事發表評論，斥責尼克森力圖把美國

註⑥

「中共近期在國際間發動外交攻勢的背景和目的」，香港：「南華早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

「十二大」後的中共對外政策：持續與改變

說成是中共大公無私的朋友及其利益的擁護者，又把蘇聯對中共的立場加以曲解，硬說什麼蘇聯對「中國」來說是日益加劇的威脅。評論又舉出卡特的第五十九號指令，證明美國對中共抱有敵意。評論說，五十九號指令規定，一旦中共領導人的決策發生意外轉變，也就是有不合乎美國心意的轉變時，美國就對中共進行核打擊。評論更誇張地指出：中共實際上處於美國設在西南亞、遠東、太平洋和印度洋水域，以捍衛美國的所謂切身利益的軍事基地包圍之中。評論說這足以證明美國對中共政策的敵對性質和推行這一政策的美國政治家的偽善態度^⑥。這項挑撥口吻是夠強烈的。

既然彼此都在玩牌，那就要看誰的牌技高人一籌了。過於患得患失的人，不會是賭博的能力。

六

中共一直自稱它屬於第三世界，胡耀邦「十二大」報告說：「社會主義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僅僅是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共把對外統戰活動重心移至第二世界和美國，那是一個很短暫的時期。

「第三世界」(Tiers-Monde)一詞，創自法裔阿爾及利亞學者佛蘭茲·范能(Frantz Fanon)，其他學者也多有引用，其最普遍的涵義是：泛指亞、非、拉丁美洲地區北起北緯三〇度，南迄南緯三〇度的主要部分，那裏差不多有九〇個國家(當時)。這位學者認為，此一地區內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與世界其他地區異其性質，它的開發展望，不能依據西歐的經驗去理解，爲了儘可能表現其「無色」，應稱之爲與東方世界及西方世界不同的第三世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實際是其「中間地帶論」的衍化，前者中的第三世界就是後者中的第一中間地帶。當然，在毛澤東之前，國際間已經常使用第三世界一詞，都不見得符合其原來的意義。

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澤東在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avid Kaunda)交談時指稱：美國和蘇聯構成第一世界，中間的力量，例如日本、歐洲和加拿大，都屬於第二世界，「我們(中共一筆者)和你們則屬於第三世界」。

中共的革命策略源自列寧，重視對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用，因此自有中共政權以來，它就強調亞、非、拉丁美洲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它的統戰活動主要是在此一地區。一九六四年以後「中間地帶論」中的第一中間地帶，一九七四年以降「三個世界論」中的第三世界，其實都是指此同一地區。而後一理論的提出，顯然是爲適應當時自由世界之多元平衡的理論，便於統戰策略的實施，好在國際間進行多邊鬭爭，讓其他國家分擔中共對抗蘇聯威脅的責任。實質上這個理論並不像蘇聯所抨擊的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世界力量分佈^⑦。

註⑥ 「尼克森有關蘇中關係和美中關係的談話」，蘇聯：八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V(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廣播評論。

註⑦ 「三個世界概念的反動實質」，莫斯科廣播電臺V(一九八二年二月廿四日)廣播談話。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應與他的「一個世界、兩家子、三分天下」三句話合起來看，才能瞭解。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美軍協助越南進入柬埔寨剿共，同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聲明，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文中肯定「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所謂「一個世界」是一個以「革命」為主要「傾向」的世界。

「兩家子」是一句湖南方言，毛澤東是用階級觀點處理這句話，其意義正如喬冠華所說：「談階級就只有兩家，那就是剝削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第三家。修正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變種^{①9}」。講革命就得從階級立場出發。中共始終把黨與黨的關係和與國的關係劃分清楚，就是因為黨必須嚴守階級立場，而國家關係卻是另外一回事。喬冠華說：「柬埔寨是這樣，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只要他們的人民起來革命，我們一定支持，一定大力支援」。「馬共也好，其他共產黨也好，他們的革命鬥爭，我們會一如既往支持到他們勝利為止」。又說：「建交這不過是一種國與國之間關係上的形式，並不能夠通過建交就達到改變制度^{②0}」。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建交，甚至可以組成聯合陣線去對付共同的敵人，那屬於「統戰」範疇，是國與國的關係。人民（共黨）起來推翻「反動統治階級」，那屬於革命範疇，是黨與黨的關係，中共必然支持。東南亞國家與中共建交後，鄧小平、趙紫陽等都不肯對不再支持各該國共黨作出保證，就是這個道理。在中共看來，拉起各國政府一齊反霸，和支持各國共黨推翻其本國政府，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可以並行不悖。

「三個世界論」由「三分天下」演化而來。依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大會中的說明，亞、非、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開發中國家是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第二世界是一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過去的帝、殖主義者，因為它們也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是反霸鬥爭中可以聯合的力量。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霸權主義，是第一世界，是反的對象。有一個時期中共在二者間分別主次，蘇主美次，反有先後。現今又稱美國為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二者已沒有軒輊，在第三世界要同時反兩霸。

弄清楚上述各點，我們再來看胡耀邦「十二大」報告中關於這一問題的內容。

他肯定帝、霸、殖是威脅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主要力量。舊的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但還沒掃除乾淨。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又構成對世界人民新的威脅。它們在世界範圍內展開爭奪，形成世界不安和動亂的主要根源。

他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務。然後就當前世界紛爭事件，對美蘇分別加以斥責。

他聲稱中共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具有相似的苦難經歷，面臨共同的問題和任務。中共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鬥爭，看作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

註^{①9}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喬冠華（當時為中共「外交部」部長）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所作關於當前世界形勢及中共對外政策的講話。（中共機密文件彙編）三九五頁。

註^{②0} 同註^{①9}，四〇四—四〇六頁。

他鼓吹第三世界對帝、霸要為維護民族資源、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進行經濟鬭爭。第三世界國家相互間則實行「南南合作」、彼此互助。

他說中共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一貫盡力援助與我們共命運、同呼吸的第三世界國家」。並且說：「今後，隨着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不斷擴大同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

綜上所述，會使我們得到如下的印象：中共自己要在大國間保持平衡，玩牌謀利；在第三世界以統戰策略拉攏各國共同反霸，以增加中共與美、蘇週旋的籌碼，另一方面不放棄支持各該國共黨顛覆其政府；在經濟方面，中共一則鼓動第三世界國家與先進國家從事經濟鬭爭；二則提倡第三世界國家自助互助；三則將中共對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援助，用遠期支票應付。

七

中共「十二大」後的對外政策，其基本目標與原則依然持續，其實際策略與作法則有不少改變。綜合其對外政策一般動向，當不外：(一)製造和平假象，以適應內部建設與對外統戰需要；(二)在大國間要權力均衡的玩牌手法；(三)以捨小異求大同的態度，擴大統戰範圍，也就是：(1)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口號，團結各被壓迫民族、人民，愛好和平的團體、個人。(2)以「和平共處」原則，改善同世界各國的關係。(3)「本着向前看的精神」^②，擱置意識對立，發展同各國共黨及工人階級其他政黨的關係。「十二大」前後，中共已展開活躍的對外活動，這一廣泛的統戰攻勢，值得吾人注意。

註② 胡耀邦宴請法共中央代表團時語。見《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電。

「共黨民主集中制之批判」

劉勝驥著

本書研究共產國家選舉、領導、組織紀律、會議報告、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了解中共式民主制度的最佳著作。

25開本 全一冊 計三六六頁

實售新臺幣一〇〇元

郵撥一四六四三一號劉勝驥帳戶